

风险社会、对话主义与重建现代性：“非典”以来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语境与路径

胡百精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Risk Society, Dialogue and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Context and Approach of Chinese Public Relations after SARS

HU Baij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风险社会、对话主义与重建现代性：“非典”以来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语境与路径

胡百精

摘要

本文从宏观社会历史视角考察“非典”十年以来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和变革，提出风险社会和重建现代性构成了公关事业演进的语境，而互联网时代的对话主义则主导了公式。“非典”昭示了现代性危机和风险社会的到来，致力于沟通、共识和信任的公共关系特别是危机管理在随后十年获得较大发展。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出路在于“对话以重建现代性尤其是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支配式宣传到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化解风险、维系利益认同、再造意义共同体，成为“非典”至今发展的主线和路径。

关键词

公共关系、非典、风险社会、危机管理、公共协商作者简介

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传播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公共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转型期的传播与社会认同”（项目编号：12ZHB018）。电邮：hubaijing@vip.sina.com。

Risk Society, Dialogue and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Context and Approach of Chinese Public Relations after SARS

HU Baijing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after SARS from the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proposes that risk society and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constitute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ublic relations evolution and the paradigm has shifted to dialogue in the era of internet. SARS heralds the emergence of risk society, thus leads to the emphasis on public relations that focuses on communication, dialogue and trust, particularly crisis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The solution to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is to reconstruct modernity through dialogue, part balanc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this context, the approach of public relations in China after SARS shifts from subjectivity to inter-subjectivity and from publicity to dialogue. Public relations in this period focus on crisis management through dialogue, value-based consensus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Keywords** public relations, SARS, risk society, crisis management, public consultations

Author

Hu Baij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s paper is a resul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he P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ject number: 12ZHB018), funded by Beijing Planning Project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mail: hubaijing@vip.sina.com.

历史总是以大事件为关键节点连缀时空网络。2003年爆发的“非典”就是这样的历史节点之一，它以“流行病”为能指和隐喻，表征了人与自然、封闭与开放、讲真相、断裂与认同、个体与共同体、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等诸多二元范畴之间的紧张对立。实际上，“非典”剧烈、显著地暴露了中国在现代性转型中遭遇的多重悖论，危机与繁荣、变革与秩序、威权与民主、族群进步之宏大叙事与个体生活之琐细纷乱。随后十年间，这些悖论搅动了社会变革的漩涡，激荡、沸腾于“改革的深水区”是作为时代标签和集体记忆的“非典”，激发了我们对新世纪发展图景和当下际遇的重新想象：风险社会来临，现代性走向“自反”，对话成为时代主题。

所谓对话成为时代主题，一方面是指对话被确认为具有普遍性和优先性的问题解决方案，或者说是实现和谐、发展和善治的首选策略；另一方面则强调对话不只是而且以自足为目的，即在风险社会、在当前阶段的现代性中，对话本身即是一种德性。风险社会下的危机日常化、公共化，现代性转型下的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勃兴，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策略和德性选择，构成了“非典”十年以来中国公共关系事业发展的背景和大背景。换言之，在危机和繁荣的双重催迫下，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积极谋求与利益攸关方的对话和共识，公关事业因此获得生长和发展的动力，于既往十年曲折前进。

一、风险社会与危机管理

“非典”爆发前后，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年、重返关贸总协定一年有余、“胡温新政”初启，用官方语文学来说就是“现代化将迎来新高潮”。尽管一路曲折，1978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堪称壮盛辉煌。如果没有发生“非典”，那么有关繁荣和复兴的宏大叙事将一如既往地统摄社会共识。然而，“非典”和紧随其后的禽流感、甲型流感等公共卫生危机，水污染、空气污染、核辐射等生态环境危机，大地震、泥石流等天灾，产品、企业、市场、金融领域爆发的管理和财经危机，拆迁、征地和其他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大规模、常态化群体性事件，以及更多关涉政治信任和决策合法性的重大危机，再加上文化、道信仰危机，让辉煌的现代化图景显得有些斑驳并投下阴影。随着阴影越拉越长，我们不得不对现代化本身做出反思，并寻找可能的矫正、补救方案。

“反思现代化”的说法并不全面，以历史的和整体的眼光看，真正需要深度关切的是现代性转型。现代化是指国家和社会由传统而至现代的动态发展过程，主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实现物质财富激增和民富国强；现代性是与传统相对应的一套观念、价值和文化的，是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及其结果。从源头看，现代性发轫于16-17世纪的欧洲，它首先意味着启蒙所确立的主体性和理性，即人从神性和王权中解放出来，成为认知、行动和进步的主体。马克思·韦伯将现代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强调财富增长、科技进步、程序设计、效率优先和功利至上，后者重视审美、道德、信仰等精神价值和终极追求。而启蒙的一个“意外”后果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价值理性衰落凋敝，在进步中失去信仰成为现代性的“魔咒”。

对进步和繁荣的片面追求使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埋藏了危机的种子：掠夺自然发展经济，导致人与自然尖锐对立，后者看起来一度被征服，却时刻可能疯狂报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机制一旦失调，便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利益板结和阶层对抗，“这种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赖中解放出来的承诺，都是以社会不平等范畴进行行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贝克，威尔姆斯，2001:73）；理性消解了信仰、道德、神话和艺术的灵韵，滋生了价值危机，现代性“只处理了人类文明表层的文化现象，未深入人类精神性的、理想性的，亦即人灵性生命的深层价值”（曾春海，2011）。

由是观之，现代性不是一个局限在西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是正在中国正在经历、展开的历史情境、社会实践和共同体命运感。尽管国情不同，但诸多危机并非中国自身的“怪病”，其实是现代性的“通病”。一些发达国家率先克服了部分危机，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则刚刚步入现代性危机四伏的阶段。“典”初步显露了繁荣之下的危机征兆，此后十年则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全面遭遇公共化、常态化的危机挑战。十年以来，财富激增而两极分化严重，功利主义猖獗道德理想衰微，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矛盾尖锐，掠夺式发展造成能源短缺、环境破坏，壮美的“中国梦”只能始于“沙逼北京，猪投上海”之足下。

当人们从财富增长带来的最初惊喜中平静下来，并逐渐感受到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灵韵黯淡和信仰缺失之苦，繁荣就不再是现代性的唯一合法性理由。社会学者斯和贝克提出，现代性将由此超越至第二阶段，即从简单现代性发展到反思现代性。“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新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工业设计现代性。”（贝克，2004：3）简单现代性所对应的社会形态是工业社会，其发展逻辑是“现代化—工业化—物质繁荣”；反思现代性则对应风险社会，吉登斯断言我们进入了由现代性的“自反”所构建的“风险社会”。

“自反”即现代性在发展中消解、否定了自己，是“自我对抗”和“现代化的基础与现代化的后果之间的冲突”。现代性的每一个关键范畴都制造了自己的反面，说酝酿了冲抵、湮没自己的风险。“技术—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最后一把钥匙，未必打开新的知识和财富宝库，反而可能触发文明自毁的旋鈕。“我们越是想拓殖未来便越可能给我们带来意外。”（贝克，吉登斯，拉什，2001：75）譬如，现代性怀有强烈的秩序和确定性情结，而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等现代化极大缩短了社会转型期，变革使社会结构持续处在漏洞百出的不确定和失序状态；又如，现代性反抗传统和专制，而进步的野心、“理性的狂妄”却导致了新的话语霸权和专制；再如，现强调生产，发达的生产造就了丰盛的消费，而消费文化导致了意义的消逝，进而形成了“去中心”、“去权威”的后现代性。

总之，现代性随着自身在广阔历史时空中的充分延展，制造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精英与大众、利益与意义、效率与公平等二元关系的尖锐对立。现代性每前进一步，对立、冲突之风险也就进一步加剧，逐渐成为个体贴身的恐慌，亦上升为全社会的普遍焦虑。在“非典”爆发的新世纪之初，“风险社会”一词尚停留在中国学者贝克和吉登斯的学术文章里，而今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普遍且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风险和危机“成为一种认知框架和价值安排，只存在危机中”（胡百精，2010：2）。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分配逻辑取代了早前的财富分配逻辑，“安全”取代了“增长”、“平等”居于社会价值排序的优先地位。在此排序下，发展固然是硬道理，全、稳定才是第一红线。红线之内，人们免除了饥饿，却新增了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危机公关、危机传播管理、突发事件应对等名目繁多的风险解、和谐稳定之道，在既往十年成为理论热点，更是实践焦点，“维稳”甚至会压倒从容的战略抉择和顶层设计。

在风险和危机的语境下，沟通以达成共识与建立信任，已成为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专门性、系统化的迫切需求，公共关系由此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在1980年代，中国现代公关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界的“新启蒙”实现了概念引进和观念“转译”；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为公关产业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和空气；及世纪特别是“非典”以来，当“风险分配逻辑”嵌入现代性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逻辑，公共关系——尽管很多组织未必采纳这个名词——开始实质性介入大问题、题，参与到那些堪为国家和社会集体记忆的重大公共决策、标志性历史事件之中，也因此获得了长久的发展动力。当然，最受重视的还是公关领域的危机管理研究和实践仅公开出版的危机管理类著作就多达300余部，相关论文1万多篇。

这与美国现代公关的发展进路大抵相应，只是前后相差百年。在1890—1920年代，美国卷入疯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一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方面垄断、阶层分化、利益板结和环境破坏等社会危机持续加重。新闻媒体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把商业和政治的罪恶暴露在阳光下，底层大众也行动起来，社争风起云涌。解决社会转型危机，谋求整体性进步，“创造物质与精神对等繁荣的世界”成为时代要务。艾维·李、伯内斯等“宣传专家”和“舆论工程师”于这期间而出，他们相信沟通乃是比对抗更好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剧烈的社会危机和族群冲突中，沟通本身即是一种伦理性选择”（胡百精，杨奕，2013）。现代由是诞生——1903年，首家专业公关公司开张。

二、拯救理性与重建现代性

面对现代性危机和风险社会，有人提出：能否绕开现代性的弊端而直抵许诺了更多解放、自由和平等的后现代？这个想法一度得到国外学者的鼓励，美国学者格里（1995：13）曾专门论及：“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就是‘后现代化’了”。

糟糕的是，后现代并非现代性病症的解药。不仅如此，后现代自身的“通病”也在转型期的社会心理、思想文化和公共生活等领域开始发作。譬如，“去中心”后迎来一个众所期待的“多中心”，而往往陷入幻灭虚无的“无中心”。在有关传统和主流价值的宏大叙事遭到怀疑后，怀疑就像欲望一样不断自我膨胀，以致于一时得可疑。当传统、现实和西方都不再可靠，眼前的利益和快感就成为生命之源，浅思、浅爱、浅交往，面子即里子。“世界已经毁掉了自身，它解构了一切，余下的乃离破碎之物。人们所做的就是玩弄这些碎片。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凯尔纳，贝斯特，1999：165）倘若后现代不以成熟现代性和充分现代化为根基，那么一种凌空蹈虚或者虚张声势的心态和姿态，与自由、解放并无根本联系。它许诺自由自在，却带来无依无靠。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中国并置于同一时空语境。这种复杂性自然影响乃至构成了中国公关事业发展的宏观背景和深层结构。现代性所倡扬的观念、成功意志、财富欲望、技术主义，以及对权威感、中心论和秩序化的追求皆投射到了公关的思想和实践上；而后现代性所采取的“反一”、“去一”叙事结构，反因果明晰的宏大叙事、反统摄一切的整体观、反工具理性、去秩序、去中心、去权威也成为公关的思考框架和行动路径。作为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后现代性的可贵在于拒斥普遍主义和基础主义，捍卫多元话语和差异性。然而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对消费符号和拟象的追逐，甚至压倒了对其所表征的世俗之物的渴望和对出世意义求；每个人都像游客或流浪者一样寄居在临时性的部落中，认同自我和理解他者、叙述过去和把握未来都越来越艰难。显然，公关在策略上的确可以“玩弄”后现代，卷入并利用消费文化浪潮，而作为一种寻求共识、信任、确定性和共同体的现代社会治理手段，公关归根到底要重返启蒙理性和重建现代性。

在吉登斯和贝克看来，克服现代性危机出路在于重建现代性，而非堕入最终将滑向虚无、终结的后现代性。实际上，吉登斯、贝克等现代性的辩护者和鲍德里亚、塔等批评者一样都承认现代性危机，比如他们都同意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单凭经济增长和知识创新已然难以解决。所不同的是，前者直面危机而力图革新和重建，“仅

另一些像后现代这样的新概念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质”（吉登斯，2000：108-109），而后者则卷入危机并为之宿命。

重建现代性就是要平衡诸如真与美、技术与道德、知识与信仰、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现代性的本体论前提及其方法论和价值观，眷顾和关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王能东，2009）。究其实质，重建现代性的思想主线在于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同进步。吉登斯主张推动“低级现代性”向“审美现代性”转变，再造声、色的世界。贝克把“重建”理解为反思和超越工业社会的理性基础，在风险社会中使现代性“充盈化”。如是，现代性的重建方案可以表述为：反对工具理性践踏价值理性也反对在重彰后者中荒废前者，它们理应在对话中均衡拓展。以中国情境论，所谓“中国梦”应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相辉映的理想。尽管工具理性在知识分子话语名狼藉，而中国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并且极力扩充工具理性的其他重要维度——科技进步、程序理性和契约精神等；同时，以伦理、审美、信仰为的价值理性建设亦应纳入国家议程和公共生活。

具体到公共关系领域，自卡特里普等人在1960—1970年代提出“双向开放”、格鲁尼格等人在1980—1990年代提出“双向均衡”公关观念后，世纪之交兴起的公辞流派、关系流派皆以对话为公关范式的核心取向。公关即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规程式对话：在事实、工具层面，对话以促进真相融通和利益互惠；在价值、德性面，对话以建立信任和分享意义。危机公关亦复如是——重建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共持的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这实质上是对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对话中重建现之宏观社会历史语境的顺应与回应。“对话最终成为时代的主题——它不仅是在混沌生成秩序的一种方式，而且是全球化语境下人类生存的基本内容。”（胡百2007）

再回到吉登斯。他提出发展多个维度的对话民主以重建现代性：“纯粹关系”即个人生活领域、亲密关系之间的对话民主，他倡导重振人际沟通，建立平等、诚实姻、家庭、性和朋友关系；社会运动和自治团体领域的对话民主，即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自治团体打破传统等级制度和权力垄断，开辟广阔的对话空间以表达和实现多益；民族国家层面的对话民主，即政党、政府和公众基于程序正义，在协商、参与中成就政治信任和合法性；全球范围的对话民主，即培育世界主义民主，以解释和解界性风险问题。吉登斯强调，对话筑基于积极信任。他把人们对既定路径、规范和权力的接受与遵从称为消极信任；把主动从他者那里赢得信任称为积极信任（Gidder 2007：140-142）。积极信任既是对话民主的产物，也是其得以存续和升级的前提。

吉登斯提出的对话民主和积极信任概念，与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概念存在强烈共振。共振源于他们对待现代性的共同立场：谴责现代性造成的压迫破坏性，同时断言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尚需进一步解放其潜能。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理性之所以一分为二并造成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根源在于启蒙以来哲学及其主体性原则的不节制膨胀。“主体性原则内蕴着‘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这就为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埋下了隐患，也为萎缩成工具理性奠定了思想根基。”（陈国庆，2012）在此原则下，自然、他者皆是主体所欲征服、为我所用的对象，科技、效率、财富由手段变成目的，个人、自自然走向分裂和对抗；价值理性和终极意义被消解和颠覆，及至精神蒙难、重返补救时已杳不可追。

哈贝马斯的改造策略是，放弃单向的主体性，即“主体—客体”之间的支配关系；建立主体间性，即“主体—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他强调拯救启蒙理性，社会整合，构建主体间性及其交往理性。在他对交往理性的设计中，“说话的人必须向听者证明自己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描述是真实的，关于道德规则的表述是正当的，内在情感的表述是真诚的”（王晓升，2008）。后来，哈贝马斯将之确立为交往理性的可理解性、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原则。交往理性是公共领域的价值规范，为和共识提供了规约、指引；它抵制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使生活世界重新成为自我完善、人际交往和社会整合的基础；在民主政治层面，交往是协商民主的必要条件，为社会主体之间的说服、辩论提供程序理性和价值动力；同时，它主张在对话中重树道德理想和伦理秩序。

毫无疑问，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很容易被认为是乌托邦的制造者。他们对重建现代性的必要性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述，但是以“对话”、“交往”为核心思想的重建未免虚泛、柔弱和理想主义，“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和美好奢望”（陈雄辉，关锋，2007）。在他们倡扬对话主义的20世纪后期，批评者的责难是：对话的时代来？

三、互联网与对话主义

现代化和技术革命再一次创造奇迹。从世纪之交至今，互联网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狂飙突进，全国性、全球性的信息传播一体化格局正在迅速形成。吉登斯、哈贝马乎没有讨论过互联网，但是他们曾乐观地宣称“必须肯定启蒙理性的成就，相信社会进步的逻辑”（章国锋，2000）。如今，互联网为他们铺设了现实通往乌托邦之蹊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和文化可能性。

互联网开启了对话时代。每一种带来根本性变革的技术都有自己的哲学，互联网的哲学是对话。事实上，互联网在技术上的“元逻辑”就是开放、对话，它可以贯通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体——世界是平的，我们都站在广场上，“无远弗届”地看得见、听得到彼此；普罗大众成为表达者，官民对话、民商对话、跨文化对话不再是星、分散或想象中的协商实践，而成为实时遍在的政治、商业和文化境况；现实社会关系被复制到虚拟空间，虚拟空间形成的社会关系也被嵌入现实空间，关系的建立射和激活突破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社会交互与权力转移都是真实存在的”（王文，2011）；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既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产物，也是社群主义、主义的杰作，它鼓励一切个体可能性和自由意志，同时抱持强烈的族群整合、社会团结冲动，各种旧的同侪、部落、社群关系全面复活，新的共同体激增、扩散。

互联网呈现和承纳了现代社会最重要、最显著的那些二元悖论，或者说关系的鸿沟——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多样性与同一性、拟象与真实、确定性与风险、全球本土化等等。无论在技术和实践层面，还是在文化和哲学层面，互联网都是这种二元对立、鸿沟深壑之张力的造物。它在对话中生长。上述多维二元关系的张力正是的动力之源，激发互联网不断聚变和裂变，进而深刻改造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

在互联网情境——“互联网上”和被互联网影响的社会情境下，对话既是达成共识、生产知识、创造意义的手段，同时也以自足为目的。这种对话观念和实践，充现并在一定意义上落实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低条件”（巴赫金，1992：344）。巴赫金强调，思想的本质即对话，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必须置于同他人的积极交往之中；对话并不谋求“永恒结构”和思律，它是不同声音的交织和争论，是不同意见和思想形成的“复调”，而单一声音——无论多少人加入其中皆是“独白”；对话的前提是差异性，对话者之间自主、独平等，谁也不是真理的绝对拥有者。那么对话将走向何处？人们希望自己被倾听，希望被别人理解，这使对话始终处于一个开放、未完成、未定论的动态过程。对话的完成性”具有深刻的哲学和历史意义，它不强求对话一定得出结论或找到答案，但鼓励人们不断选择、创造和超越。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的对话思想与现代性重建方案确实缺少“下手处”和行动者。批评者认为，他们所主张的对话在理论上是概念与概念——比如生产与消费、利益与意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互动，在实践上不过是与“对抗”相对应的某种宏大叙事，“对话者”不过是抽象的精英众、自我与他者。即使是辩护者，大多也只能称扬其作为乌托邦的方向、母题和原初关怀价值。

互联网把对话和重建现代性的行动者落实为个体，具化为个体对生活政治和生活世界的建设。从近年发展轨迹看，互联网通过改造个体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命路线图造社会，也因此可能在最彻底的意义上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路线图。吉登斯把简单现代性阶段的政治范式称为“解放政治”，它以进步、理性、主体性为主题，旨在从物质匮乏、神权和政治专制中解放出来，而重建现代性则应培育对话民主和“生活政治”。解放政治把眼光投向国家、阶级和社会等宏观范畴，专注于“怎样把人从的和制度层面上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中解放出来”，而忽视了个体的、内在的“微观解放”（许丽萍，2005：1）。生活政治关心的是“我们如何生活”，直面身体、我、认同、道德、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等解放政治以之为平常、琐碎的问题。乐观地看，外在的、宏观的、制度性的解放与内在的、微观的、精神上的自由，在互联网获得了并行不悖的希望。

鉴于公共关系已经全面、深入地渗透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以上呈现的理论和现实图景，与当下的公关观念和实践变革其实一点也不遥远。“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重大政治公关个案，以及市场领域此起彼伏的危机公关个案、日新月异的商业公关个案看，公关在既往十年显著介入了这场变革：形塑新的政治、经济交往形态，构建新的社群、民族国家和全球秩序，培育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和道德理想，或可酝酿一轮新的启蒙。“介入”意味着自身也是变革的一部分，并因此承受了变革的阵痛，譬如方向未明、方法错乱，乃至道德溃败、精神贫弱；同时，公关作为变革的“介入”者，尚应抱持现代性的

我们需要在互联网时代再度启蒙，以适应诸如风险社会、消费文化、全球化等生存境况。新启蒙要通过对话健全当前“残缺的现代性”，让所匮乏者取得优势，直所欲矫正者达成动态平衡。公关自然不是新启蒙和重建现代性中最重要、最突出的手段，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之手段”：在互联网时代，以沟通为业、以对话为主导的公关，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体拓展程序理性和契约精神，实践伦理、审美和信仰等价值理性的基本手段。对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的大社群而言，对话主义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就必不可少地采取公关手段或具有公关属性、功能的行动方案。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支配式的宣传到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化解风险、克服危机、重彰理性、持续进步、维系认同、再造共同体，正是“非典”十年以来公关事展的主线和路径。这条主线显现于对话以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培育生活政治、重构生活世界、健全现代性的宏观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互联网将此语境构建为时空的对话场域：在其中，有人追求知识、真理、确定性、同一性、灵韵，有人“戏弄碎片”、任意自在、过“反一”和“去一”的多样生活，其实每个人都同时怀有上述渴望——而这也就是人本来应有的样子，才是真正的进步、自由和解放。

我们对于公关、互联网、对话和重建现代性方案的全部讨论，只是对可能性、趋势、潮流的观察和预演。它们必然遭遇曲折、阻断，乃至向相反的方向奔逸。而我做智性和德性的主体，顺应并引领潮流的方向。杜威（1957：164）的一个论断大抵可以充作今日勉励的宣言：“今天，我们在理想之事上是虚弱的，因为智识已然与分道扬镳……当哲学能够与变革之力相称，能够让日常生活的意义清晰且一贯地彰显，科学与情感将彼此渗透，实践与想象将相互拥抱。”（Dewey, J., 1957:164

（责任编辑：李凤萍）

注释 [Notes]

1. 参见新华社（2012年11月17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3年3月22日访问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陈国庆(2012).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启示.《理论探索》, (1), 48-51.

[Chen, Guoqing (2012). Habermas and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1), 48-51.]

陈雄辉, 关锋(2007). 交往的乌托邦: 哈贝马斯人类解放思想评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130-144. [Chen, Xionghui & Guan, Feng (2007). Utopia of Communicati